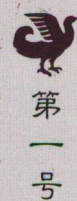


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论文集

早期文明与峡江汉墓研究

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科研成果丛书



◎无锡市文化遗产局编委会 编

文物出版社

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科研成果丛书(第1号)

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论文集

早期文明与峡江汉墓研究

无锡市文化遗产局编委会 编

文物出版社

2011·北京

封面设计 张希广

责任编辑 窦旭耀

责任印制 王少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论文集: 早期文明与峡江汉墓研究/无锡市文化遗产局编委会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 - 7 - 5010 - 3241 - 9

I. ①无… II. ①无… III. ①考古—中国—文集 IV. ①K8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3560 号

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论文集

早期文明与峡江汉墓研究

无锡市文化遗产局编委会 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 政 编 码 : 1 0 0 0 0 7

[http : // www . wenwu . com](http://www.wenwu.com)

E - mail : web @ wenwu . com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787 × 1092毫米 1/16 印张:13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978 - 7 - 5010 - 3241 - 9 定价:140元

《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科研成果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 叶建兴

副主任 刘基平 杨建民

主 编 刘宝山

副主编 李一全

编 委 韩翀飞 薛 琳 邵 栋

绘 图 薛 琳

编 审 李一全

序

李伯谦

无锡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 2009 年 7 月组建完成,一年半之后即推出由所内同仁执笔的第一本论文集《早期文明与峡江汉墓研究》,其速度之快,令人惊讶!令人振奋!因此,当无锡市文广新局建兴局长和文保考古所宝山所长邀我为之写序时,我没有推辞,我觉得应该借此给以鼓励,即使文中有需改进之处也应指出,以利今后更好的提高发展。当然,通过阅读他们的书稿,我自己也获得了一个学习的机会。

这本论文集共收入三篇大作,一篇是薛琳的《良渚文化出土玉琮研究》,一篇是韩翀飞的《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的几个问题》,还有一篇是李一全的《峡江汉墓初步研究》,三篇文章合计 40 万字,即此已足见其为三位作者的倾力力作。

玉琮是良渚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最具神秘色彩的文物之一,因此也最受研究者的关注,围绕玉琮发表的文章,恐怕也是良渚文化研究论著之中最多的一种。我看到过的专门研究玉琮的文章不算很多,但就我曾过目者言,涉及玉琮方方面面如此全面的,《良渚文化出土玉琮研究》一文也应该是有数的不多几篇中的一篇。该文除前言和后面的参考文献共分十章十节,分别从玉琮有关文献记载与研究历史、原料产地推断与类型划分、随葬玉琮墓葬情况与墓主性别研究、玉琮的用途功能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作了探讨。文章收集材料丰富,有关的文献记载、传世与考古资料、相关研究论著基本收罗齐备,从其有 248 个注释、附列 68 篇参考文献即可见一斑;文章评价公允,对前人成说能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作出评论,对同代人的研究论著能通过相互比较指出其长处和不足,有实事求是的平等切磋,无强加于人的武断;文章有独到见解和创新之处,这在玉琮起源、玉琮分期、良渚文化随葬玉琮墓葬墓主性别推断以及玉琮功能与用途的讨论中均有表现。由此可见,《良渚文化出土玉琮研究》无疑是一篇成功的作品。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一直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展开,围绕着该问题的讨论一波紧接一波,不断取得进展和丰硕的成

果,《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的几个问题》一文是当前该问题讨论中最新几篇中的一篇。该文也分四章,第一章“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有六个小节,分别讨论了“文明”的概念、文明起源探索的历程、文明起源模式的探索、古代文献记载中的中国文明起源、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化进程及龙山时代已具备成熟文明的特征;第二章“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形态研究”三个小节,分别讨论了聚落考古研究历史和应注意的问题、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聚落形态的特点和对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形态的分析;第三章“龙山时代聚落形态研究”三个小节,分别从单个聚落、以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展开研究,并对研究成果作了总结;第四章“新石器时代宗教遗存初探”不分节,专门围绕考古遗址中与宗教有关的遗存作了探讨。对上述诸问题的研究,看上去详略不一,繁简有别,各章节的分量似乎不很均衡,但对重点问题都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例如第一章“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化进程”一节,将距今 7000 至 6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分为早、中、晚三段展开论述,就使读者清晰地看到了文明因素从孕育诞生、初步发展到进入初级文明阶段的过程;第二章“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形态研究”,并非一开头就从晚期切入,而是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聚落特点开始,紧接着又将晚期分为早、中、晚三段依次展开,步步深入,使读者进一步从聚落演变角度看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已形成的初级文明社会的面貌;第三章“龙山时代聚落形态研究”,是第二章“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形态研究”的继续和深入,在对单个聚落和以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分别剖析基础上,从多个方面论证龙山时代已进入城、乡分化的比较成熟的文明社会,增强了其所作论断的说服力。

收入本论文集的第三篇大作《峡江汉墓初步研究》,资料丰富,论证严谨,条理清晰,图文并茂,是一篇典型的考古学论著。文章除前言、附录和参考文献,共分六章,分别梳理交代了峡江地区汉墓发现与研究简史、墓室结构形制、随葬品型式划分、分期与年代、墓葬的文化构成因素及汉墓反映的生死观念。峡江地区的文化遗存尤其是汉墓,过去较少受到注意,自三峡工程启动以来,随着三峡文物保护抢救计划的实施,大量汉墓被发掘出来,在多数发掘报告尚未出版的情况下,作者能推出如此全面系统的一部论著,确属难能可贵。我读过之后,留下深刻印象,也学到不少东西。关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型式划分,作者比较严格把握了型与式的区别,以型表示同时存在或时间上虽有先后但无发展关系的墓葬形制或随葬品整体上的不同,以式表示同型之内的墓葬或随葬品局部变化反映的具有发展关系的早晚的区别,这样读者即能根据型式之不同判断其内在逻辑发展演变关系;关于分期与年代,正如作者所言,分期是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类型学研究成果做出,因而具有较为坚实的科学基础,当然建立在

类型学基础上做出的分期只是相对年代,作者继而利用出土的纪年文字材料和随葬品中的铜镜、钱币研究成果一一推定了各期的绝对年代,从而构建起了峡江地区汉墓的分期年代标尺,为今后研究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年代学依据;关于文化因素分析,作者从峡江地区所处地理位置和环境出发,结合考古发现和有关文献对当地曾经有过的国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记述,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中分析出多种来源各不相同的文化因素,揭示了峡江汉墓体现出的一种由区域性为主到多种文化并存,从多文化并存到大一统的中原文化的演变过程;关于汉墓反映的生死观,此章虽显简略,但通过考证,也基本廓清了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及形制纹饰变化反映的人们思想观念、宗教思想的变化。

学术研究是一个充满乐趣和挑战、不断通过否定之否定逐步接近客观真理的过程,三篇大作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但也还有可以讨论、改进之处。就我初步研读所得印象,我觉得《良渚文化出土玉琮研究》在“玉琮对后世的影响”一节还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时代变了,出土的地域方位变了,在墓葬中的放置位置变了,经过改制原来的形制花纹变了,玉琮原来的性质和所具有的功能、用途肯定也在变化,在商周时期出土的玉琮上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看出变化比较容易,要揭示变化的意义尚需花费力气,希望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努力。《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的几个问题》结构上显得有些松散,文字上有些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这个核心问题的深入,建议加强论文写作的严谨性、规范性锻炼;引用别人的研究成果,不管同意与否,都需经过论证。《峡江汉墓初步研究》第六章“汉墓与汉代生死观”较前几章略显薄弱,建议从汉代社会演进的大背景出发,围绕人死后入殓、下葬及葬后善后处置等整个葬礼的过程进一步考察汉代丧葬礼仪,以揭示汉代社会的思想观念及其变化。

本论文集的三位作者都受过良好的考古学教育和田野考古实地锻炼,知识面广,基础扎实,又热爱考古工作,在新的工作岗位和研究中一定会拿出更多更好的成果,这是你们所在的新组建的无锡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的愿望,也是全国考古同仁们的热切期待。

2011年2月5日

目 录

序	李伯谦 1
良渚文化出土玉琮研究	薛 琳 1
前 言	2
第一章 有关玉琮的文献记载与研究	5
一 有关玉琮的文献记载	5
二 玉琮研究学术史	7
第二章 考古出土良渚文化玉琮类型学研究	12
一 我国玉琮的出土概况及其原料产地问题	12
(一) 玉琮出土概况	12
(二) 苏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原料的来源	13
二 玉琮的类型学分析	19
(一) 良渚文化玉琮出土发现史	19
(二) 关于玉琮形制的起源问题	21
(三) 良渚文化出土玉琮类型学分析	27
(四) 良渚玉琮的发展传播	32
第三章 良渚玉琮的埋藏学及相关问题研究	37
一 良渚文化玉琮出土位置研究	37
二 出土玉琮的良渚文化墓葬通常具有的特征	41
三 玉琮与墓葬中其他玉质随葬品的共存情况	43

四 随葬玉琮的墓主性别研究	47
第四章 相关问题讨论	50
一 玉琮的用途与功能	50
(一)“礼地的玉神器”说	51
(二)“玉殓葬”说	51
(三)“中国古代宇宙观和通天行为的象征”说	51
(四)玉琮功能的演变	52
二 玉琮对后世的影响	53
参考文献	71
 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的几个问题	韩翀飞 76
第一章 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	77
一 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过程	77
二 “文明”的概念	78
三 文明起源模式的探索	78
四 古代文献记载中的中国文明的起源	79
五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化进程	80
六 龙山时代已具备成熟文明的特征	83
第二章 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形态研究	87
一 聚落考古的研究历史和应注意的问题	87
二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聚落形态的特点	88
三 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形态研究	90
第三章 龙山时代聚落形态研究	99
一 单个聚落研究	100
二 以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研究	103

三 结语	108
第四章 新石器时代宗教遗存初探	109
一	109
二	110
三	112
四	114
五	115
峡江汉墓初步研究	李一全 123
前 言	124
第一章 峡江汉墓的发现与研究	126
一 20 世纪初期至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	126
二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末	127
三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今	129
第二章 峡江地区汉墓的基本形制分析	133
一 土坑墓	133
二 砖室墓	137
三 石室墓	140
四 土洞墓	142
五 其他墓葬形制	143
第三章 峡江汉墓随葬品形制分析	145
一 铜器典型器物分期	145
二 陶器典型器物分期	149
第四章 峡江汉墓的分期与年代	157
一 分期	157

二 年代	160
第五章 峡江汉墓的文化因素分析	164
第六章 汉墓与汉代生死观	172
附 录	181
参考文献	189

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	叶建兴 193
-------------------	---------

良渚文化出土玉琮研究

薛琳

前 言

古老的玉文化是我国特有的文化遗产之一^[1]。《礼记·玉藻》：“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此语充分表明了中华民族爱玉崇玉的民族心理。崇尚美好品德的中国人用玉来象征一切美好的品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玉不屈不挠的品质写照；“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则是最神圣的悼念；《礼记·学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以玉劝学，意在向善。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对玉这个字的使用每每含有褒意，把玉作为道德化、人格化的象征^[2]。人们只要一提到玉，便会产生一种崇尚美德、积极向善的肯定的文化价值取向。我国独特的玉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与灵物崇拜、王权政治以及审美意识联系在一起，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是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一个独特领域。从辉煌的史前玉器绵延至今，我国用玉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它兼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内涵，从而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国玉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展开，史前玉器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红山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以及龙山文化玉器等。红山文化的动物造型玉器及圆形玉器精巧传神；龙山文化玉器则兼具了南北文化的双重特征；良渚文化玉器以琮、璧、钺最为典型，造型雄浑、风格严谨，纹饰以神秘莫测的神人兽面引人入胜，代表了当时中国南方玉雕的最高水平^[3]。良渚文化玉器制作之精细和纹饰之繁缛，表现出空前的工艺技术水平^[4]。杨伯达先生指出，史前玉文化“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不断干预社会生活，并逐步广泛化、深入化，终于成为文化主体，成为巫神媒介及华夏文明基础的第一块奠基石”^[5]，这凸显出新石器时代出土玉器研究的重要性，对探讨我国玉器的源流问题、用玉制度甚至文明起源等问题都有很大的启示。

玉琮是我国史前考古文化中极富特色和文化蕴含的器物之一，同时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玉文化中最具形体创意和体量最大的代表性器类之一^[6]。玉琮的起始年代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北至中原的龙山文化，西至甘青的齐家文化、四川的广汉三星堆祭祀坑、金沙遗址，南至广东石峡文化等都发掘出为数不少的玉琮，其中尤以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玉琮最为发达，出土与传世数量很多，成为玉琮研究的主要对象。玉琮在商周时期继续沿用，成为《周礼》所述“六器”之一。《周礼·大宗伯》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

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7]这段文字记载对于帮助我们理解玉器的文化内涵与功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玉琮成为祭祀用玉礼器的一种,可见其在古代社会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张光直先生认为:“玉器时代在中国正好代表从石器到铜器的转变,亦即从原始社会到国家城市社会中间的转变阶段,而这种转变在中国社会史上有它自己的特征。玉琮在中国古代文明史和社会进化史上的重要性在此。”^[8]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出土玉琮的数量和种类也有所增加。玉琮的研究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围绕玉琮的起始年代、功用、文化内涵作了大量的研究,展开了长期的讨论,并且把研究方向从原来仅由历史文献出发对应到考古出土的玉琮转向利用考古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埋藏学、性别考古学以及宗教考古等方法来对玉琮进行研究解读,对玉琮的形而上研究深化了整个玉文化的研究。

早期对玉琮的研究主要是根据《周礼》的记载,如清末吴大澂的《古玉图考》以及后来那志良先生的《古玉鉴裁》对玉琮的考证。然而,《周礼》作为战国晚期的一部托古著作,仅以此为依据加以论断是缺乏说服力的。当代学者更多的是根据考古发掘中玉琮的出土位置、共出器物、墓葬规格以及墓葬中的其他现象进行综合分析。首先是对玉琮的型式划分,进行分期断代。王巍先生在《良渚文化玉琮刍议》一文中将玉琮分成短筒形琮和长筒形琮^[9];刘斌先生的《良渚文化玉琮初探》一文中则以横截面为依据,将玉琮分成横截面为圆形、弧边方形、正方形三种,并认为其间存在着前后承继的逻辑关系^[10];安志敏先生则在《关于良渚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将玉琮的形制分为圆体内孔和方体圆孔两类等等^[11]。

在类型学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推断。如邓淑萍先生在《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玉器篇·一》中推测“琮在典礼中套于圆形木柱上端,用作神祇或祖先的象征”^[12]。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光直教授在《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的见解:“琮是天地贯通的象征,也便是贯通天地的一项手段或法器”^[13];车广锦教授在《玉琮与寺墩遗址》中发展了张光直教授的观点,认为“寺墩遗址本身就是一个大玉琮”,从而进一步深化了玉琮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是“象征王权、神权和整个统治阶级的重器”^[14]。颇具独创意义的是汤惠生教授在《对立与统一:原始文化中的二元逻辑》一文中结合萨满教理论证实“玉琮外方,象征地;中间圆形柱状,象征通天的‘地轴’、‘天柱’”,“昆仑山上的天神和太阳神也就是玉器上的人面像应该就是中国古典文献中所称的‘黄帝’”,进而提出“饕餮纹即太阳神之传承”的观点等等^[15]。虽然至今尚

未统一认识,但围绕玉琮涌现了一大批颇有质量的理论文章,从多角度进行了剖析。总的来说,发展到后来,对玉琮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将其作为原始宗教巫术、财富价值、权力地位的象征,由早期的物质角度转向精神角度。

基于目前学术界对玉琮研究的新动向,本文拟在对目前的实物资料进行归纳整理的基础上,建立起玉琮的类型学序列,为分析玉琮的文化内涵提供时空方面的依据。此外,从玉琮的分布区域、墓葬中玉琮的出土位置以及与其他玉质随葬品的共存关系等方面对玉琮进行综合分析,旨在解决我国新石器时代玉琮的产生及其分布区域、玉琮的使用方式及其形制演变等问题,从而加深理解我国新石器时代就形成的玉琮这一“玉礼器”的使用及其文化象征。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在前人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课题进行系统的和整体的综合研究,从考古资料出发对新石器时代出土玉琮进行类型学分析,结合玉琮出土的位置、所在墓葬墓主人的性别、与其他玉器和器物组合的情况、出土玉琮的墓葬规模以及文献资料来分析玉琮的发展源流、用途、意义等,对玉琮的文化内涵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第一章 有关玉琮的文献记载与研究

一 有关玉琮的文献记载

玉琮是中国古代玉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玉璧、玉圭、玉璋、玉璜、玉琥一起被古人称之为“六器”。关于琮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先秦文献;到汉代,文献中关于玉琮的记载并不多。清末,吴大澂引用《周礼》、《说文解字》为琮定名。不过,文献对玉琮的记载从名称到尺寸以及功用等纷繁复杂,甚至语多抵牾,让人不得要领。

李学勤先生曾在《走出疑古时代》中根据冯友兰先生的“信古—疑古—释古”的“三阶段”说,倡导“以考古探索古史”,并重申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不能做到的,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16]。因此,我们有必要仔细分析、归纳文献中关于玉琮形式、用途、功能的记载,并结合相关的考古学材料对玉琮及其相关材料加以分析、归纳和论证。

“琮”字最早出现在《周礼》中,《周礼·冬官·考工记·玉人》:“璧琮九寸,诸侯以享天子。”“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頍聘。”“组琮五寸,宗后以为权。”“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谓内镇,宗后守之。组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为权。”“瑑琮八寸,诸侯以享夫人。”“注:圆曰璧,方曰琮。聘礼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众来曰頍,特来曰聘。组读为组,谓以组系琮为称锤权重也。大琮如王之镇圭,射谓其外之鉏牙也。”“按,琮形八角,径八寸,角各出二寸。”^[17]在《周礼》中,已将玉琮分为不同尺寸、不同种类了。所谓“宗后”,就是“宗子”,即宗法制度中大宗的夫人,也就是分封制中诸侯的夫人。宗后以不同形制的琮为权、为内镇,诸侯也以琮作为献给宗后的瑞器,可见琮是地位尊贵者的标识^[18],所以在后来的典籍中,通常将琮作为玉礼器而提及。但是周礼并没有确切描述琮究竟是什么样的器物,先秦古书中一般也只提到“琮”之名,很少描述其形状。

汉儒在《周礼》的基础上对琮做了解释。《说文解字》:“琮,瑞玉,大八寸,似车釭。从玉,宗声。”^[19]这是对琮的最早定名。“瑞玉”说的是玉琮是一种礼器,“大八寸,似车

釭”就是对玉琮形状大小的描写。

《白虎通·文质篇》曰：“圆中牙身玄外曰琮”。“内圆象阳，外直为阴。”^[20]

“玄”字一般引为“方”。现在所见到的“瑞玉”图形，最早的是东汉石碑上的《六玉图》，其中玉琮的形状有八角、五角或十角，皆是“汉人依据《三礼》经书和汉儒的注释而加以想象绘成的”^[21]。该观念影响了后人对琮的理解。南唐徐锴释琮时指出其“状若八角而中圆”^[22]。

从文献记载看，除“鼻寸有半寸外”，其他尺寸均应该为玉琮的长度。故而，我们可以确定玉琮多数为长方体，大致形状为外方内圆，中央作圆筒状，外周呈钝角形。由于西周时期的玉琮发现已经极少，汉代已不见用琮随葬，汉代文献中几乎没有关于使用琮的记载。

《周礼·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孤执皮器，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鹩，工商执鸡。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注：“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也……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象天，琮八方，象地……”“琮之言宗，八方所宗，故外八方，象地之形。中虚圆，以应无穷，象地之德，故以祭地。”“疏：易云天玄而地黄，今地用黄琮依地之色。”^[23]

这段文献描述了国家政体、社会分层和宗教祭祀三个方面的基本礼仪。所谓“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所说的便是天下共主与诸侯这样的国家政体；“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则是描述了诸侯国的社会和政治分层；“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讲述的是王朝的祭祀礼仪。这些都是以西周以来的中原王朝为蓝本加以系统化整理出来的。有一点值得注意，不同色质、不同形制的玉器，其功能和象征系统是不同的。“六瑞”的功能在于体现政治体制，不同的器形代表不同的政治权利，象征着中央王朝和诸侯国的统属关系。“六器”的功能在于体现祭祀礼仪，即“以玉事神”，象征着对天地四方的贯通，代表着意识形态的权力，也就是所谓的神权^[24]。

《周礼·典瑞》：“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敛尸。”^[25]

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礼异》：“古者安平用璧，与事用圭，成功用璋，边戎用珩，战斗用璊，城围用环，灾乱用隼，大旱用龙，龙节也，大丧用琮。”^[26]

《周礼·秋官·小行人》：“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合六币：圭以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锦，琥以绣，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诸侯之好故。”郑玄注：“五等之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27]不同的玉器象征不同的身份地位。